

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一）

李致忠

一、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唐孔颖达等奉敕撰 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宋刻越州本《六经》之一。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享年七十五岁。少时曾从刘焯问学。隋大业初被选为“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入唐后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精于经学，尤明《左传》、《尚书》、《易》、《毛诗》、《礼记》。所以于唐初贞观中奉唐太宗之命，领衔编撰《五经义疏》。《五经义疏》后名《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所谓正义，系指对经书原有的注释重新加以疏证，使论归一定，不再产生歧异。

《易》上下经用三国魏王弼注，《系辞》以下用晋韩康伯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礼》用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在疏证的过程中，孔颖达能对南北经学家的见解进行调和折衷，取其切中经义者。故书成之后由政府颁布为经书定本，处于独尊的地位。唐五代乃至宋，多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以后均成为《十三经注疏》的组成部分。

《春秋》本是编年体史书。《左传》是左丘明注解《春秋》的专著。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春秋》立于学官，又相传为孔子所作，所以被尊为儒家的经典之一。而《春

《春秋左氏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也便流行开来。到了晋朝，又有杜预起而为《春秋左传》作注，形成了《春秋左传》的权威性注释。其后又有沈文阿、苏宽、刘炫诸家为《春秋左传》作义疏，对杜注颇有是正。如刘炫，便指出杜注之失一百五十余事。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虽以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基础，但又旁征博引，搜集杜预《春秋释例》、贾服旧注，以及沈文阿、苏宽、刘炫等人的义疏；引用《三礼》、《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等相关资料，融会贯通，注释详备，成为注释《春秋左氏传》的代表性作品。

进入宋代以后，雕板印书兴盛起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大量刊印行世。然于经书，则经、注、义疏各自单独刊行，阅读起来极为不便。逮至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首将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礼记正义》。该书后有一道主持刻印此书及《毛诗》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的跋文，于越州本《六经》的校刻缘起和过程，叙述得言简而意详。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侵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遗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这篇跋文指出：第一，自京城国子监到蜀中的刻本，都是把经文、注文省去，只刻疏义（正义）单行。加上篇章散乱，读起来非常不便，览者实在以此为弊病。第二，两浙东路茶盐司在绍兴年间，曾把《易》、《书》、《周礼》三经的正经、注文及疏义合刻在一起，会萃为一书。这样就解决了经、注、义疏各自单刻的弊病，而使之便于披阅了。然而过去只是汇刻了这三经，其它三经尚付阙如。第三，黄唐本人于绍熙辛

亥仲冬官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照前三经一样，将经、注、疏编汇在一起，精心加以校勘，雕板印行，以增广前人之所未备。第四，至于《春秋》一经，因自顾力有不足，只好姑且留给以后有同样志趣的人去做了。归纳起来，这段跋文告诉我们，至黄唐为止，两浙东路茶盐司已将五经的经、注、疏各自合刻在一起了。《春秋》一经的合刻工作则冀望于以后的同志了。

检（万历）《绍兴府志》，黄唐是在绍熙二年出任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的。其前任是李沐，绍熙元年（1190）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至二年仲冬，也就是十一月，黄唐来此接任。黄唐的后任是陈杞，他于绍熙三年（1192）接替黄唐做茶盐司提举，四年（1193）又改任提刑司。这种事实证明，跋文中所称“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是完全可信的。这就是说黄唐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毛诗正义》及《礼记正义》两部经书的校刻工作，这种速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惊人的。绍熙三年，也就是黄唐跋文中落款所说的“壬子秋八月”，当着两经刚刚刻完，黄唐上任仅十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已知将有陈杞来接替，故说出了“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遗同志云”这类颇带感情的话。

果然真有黄唐的知音和同志，就在他离任不久便操起了他的未竟之业，开始校刻《春秋左传正义》。不过继承黄唐冀望事业的不是两浙东路茶盐司，而是与茶盐司同处一地的绍兴府政府。此由沈作宾的刻书后序可以得到证明。不过原书上的沈氏序文早已佚去，今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录出，以防再佚。

“作宾叨蒙异恩，分阃浙左。仰体圣天子崇尚经学之意，惟恐弗称。访诸僚吏，则闻给事中汪公之为帅也，尝取国子监《春秋经传集解》、《正义》，参以闽、蜀诸本，俾其属及里居之彦，相与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观之，小有讹谬，无不订

正。以故此书纯全，独冠他本。不憚广费，鸠工集事方殷而遽去。今检正俞公，以提点刑狱兼摄府事，亦尝加意是书。未毕而又去。作宾窃惟《春秋》一经，褒善贬恶，正名定分，万世之权衡也。笔削渊奥，虽未易测知，然而左氏传、杜氏集解、孔氏义疏，发挥圣经，功亦不细。萃为一书，则得失盛衰之际，与夫诸儒之说是非异同，昭然具见。此前人之雅志，继其后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诸经正义既刊于仓台，而此书复刊于郡治，合五为六，炳乎相辉。有补后学，有裨教化，遂为东州盛事。昔熙、丰大臣疑是经非圣哲之书，不列于学官，识者痛之。中兴以来，抑邪讹，尊圣经，乃复大显，以至于今。世道所关，不可以无述也，于是乎书。庆元庚申二月既望吴兴沈作宾谨题。”

沈作宾，字宾主，归安人。他初判绍兴时，知府是丘宙。丘宙字宗卿，江阴人，进士出身。乾道间尝知秀州，筑堤捍海，为苏、湖、秀三州开创了无穷之利，声名卓著。待改知绍兴府时，威名益著，作风也就更骄横。沈作宾来判绍兴，正遇丘宙得意之时。丘宙对待僚吏甚严，僚吏颇有微词讪谤。作宾能从容裨赞，以宽和济之，维护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庆元五年（1199），沈作宾由通判升任郡守，更有机会推行善政。是时，韩侂胄用事，其居越州的族人违犯酒禁，作宾不畏权势，将其依法逮捕入狱。又报请减免属邑和买及岁修攒官钱，民得其惠，口碑载道。对前两任都未完成的《春秋左传正义》的雕印工作，也倾心操办，卒成其事。检〔万历〕《绍兴府志》，庆元四年（1198）的绍兴府知府是汪义端，也就是沈氏后序中所说的校刻《春秋左传正义》“鸠工集事方殷而遽去”的汪公。汪义端离任绍兴府后，检正俞公以提点刑狱的资格兼管了一段绍兴府事。他虽也加意《春秋左传正义》的雕印工作，但未毕而又离去。沈作宾来知绍兴府，于公务鞅掌之余，绍继前二公的未竟事业，卒竣其功。与两浙东路茶盐司镌刻之其他五经，“合五为六，炳乎相辉……遂为

东州盛事。”

庆元六年绍兴府所刻的《春秋左传正义》，与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易》、《书》、《周礼》、《毛诗》、《礼记》正义一样，仍是将经文、注、疏合刻在一起，是《春秋左传正义》经、注、单疏合刻的第一个版本。其版式亦取茶盐司所刻五经規制，仍为每半叶八行，行十五、六字不等，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看去开版宏朗，字大如钱，纸墨精良，不失宋代官刻经书的气概。刻工有葛昌、宋瑜、张谦、何澄、杨暹、许贵、李侃、徐宥、张明、张晖、毛俊、丁拱、宋琚、何镇、顾祐、何昇、李倚、许成之、吴宥、朱涣、李光祖、王定、方茂、陈晃、王宗、杨昌等。其中葛昌、张晖、毛俊、王宗等，亦见于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礼记正义》上，说明他们亦曾参加过《礼记正义》的镌刻工作。所以这批刻工是越州地区或是杭州地区的良工，故经常为官府所聘用，操刀镌板，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版刻遗产。

该书各卷钤有“秋穀图书”、“北平孙氏”、“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季印振宜”、“沧苇”、“昆山徐氏家藏”、“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等印记，粗略地反映出此书的递藏关系。

“秋穀图书”朱文方印，真伪难辨。若是真记，那就锦上添花了。因为“秋穀图书”一印，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藏书印。此书若真是经他收藏过，那就真称得上是流传有自了。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南宋理宗贾贵妃之弟。喜藏古物字画及善拓珍本。世綵堂廖莹中曾做过贾似道的门人，为其管理藏书。庆元六年绍兴府刻的《春秋左传正义》，由于是首次将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又刻印精美，故为贾似道珍视而收藏也未可知。

“北平孙氏”指的是孙承泽。孙承泽字耳伯，号北海，又号

退谷。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入清历官吏部侍郎。喜藏书，精于书画鉴赏，筑万卷楼以庋之。又有研山斋，亦是他的藏书处所。他本是山东益都人，由于世隶上林苑籍，故又称北平。书中既有他的藏书印记，表明此书在明末清初曾经孙承泽收藏过。

“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沧苇”、“季印振宜”等印记，都是季振宜的藏书印。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清代扬州泰兴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兰谿令，历官刑、户两曹。擢御史。家本豪富，江南故家之书多归之，精本最富。《季沧苇书目》载宋元板刻以至钞本，几乎无所漏略。《述古堂书目序》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所以季氏藏书半出于钱氏述古堂。吴兔床亦云“述古堂之书，后尽归季沧苇侍御。”足见季振宜的藏书不少来自钱遵王的述古堂。而《春秋左传正义》则可能来自孙承泽万卷楼。

“昆山徐氏家藏”，是徐乾学的藏书印。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清代江苏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刑部尚书。曾筑传是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斲木为榱，贮书若干万卷，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缥緙帙，启钥烂然。宋刻《春秋左传正义》盖由季振宜辛夷馆，又传给了徐氏传是楼。由传是楼散出后，又展转归入涵芬楼，故书上仍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等印记。最后由涵芬楼又归入北京图书馆。

二、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 宋张洽撰 南宋德祐元年（1275）卫宗武华亭义塾刻本。北京图书馆原著录为宋刻本。

张洽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卒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享年七十七岁。卒谥文宪。洽少年颖异。“尝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旨归。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通

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熹嘉其笃志，谓黄乾曰‘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①嘉定元年（1208）登进士第，授松江尉，改袁州司理参军，寻知永新县，通判池州，皆有善政。端平初年，大臣多举荐张洽，召赴都堂审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1237）以疾乞致仕，同年十月溘然仙逝。卒后一日，又有旨除直宝章阁。平生所著有《春秋集传》、《左氏蒙求》、《春秋集注》、《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及其自己的文集。本文所要讨论的，便是其中《春秋集注》的版本问题。

张洽是朱熹的高门弟子，思想自然摆脱不了理学家的桎梏。然其学问淹洽，学风严谨，故其解经之作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他的《春秋集注》，“乃能析三传之异同，溯关洛之本统，做文公朱先生《论孟集注》，泛取先儒之至当精义，而间附以己意，集为书十一卷。……抑亦补师门之未备。……公于《春秋》又有《集传》二十八卷、《左氏蒙求》一卷。《集注》最晚出，屡经删润，尤号精密。”^②故于端平元年（1234）八月初一日尚书省便下达了札付临江军的牒文，称“访闻临江军新宫观张秘著居家力学，多有著成书，有裨治道，可备乙览。须议指挥右札付临江军，令守臣以礼延请，询访件目，差能书吏人，赍纸扎如法誊写，就委本官点对无差误。并缴申尚书省，以凭投进。”^③足见张洽的著述当时已引起朝廷青睐，并下令征集，以备皇帝乙夜之览。而当着临江军于八月初五日收到尚书省这道牒文并于九月初转知张洽时，洽便于九月初七日先复了一纸呈请修订状文。文称：“洽旧尝著《春秋集传》、《春秋集注》及《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虽已粗成篇帙，其间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来忽准朝旨，令行缴纳。……其在草野愚儒，虽知非称，其敢以芜陋为辞！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当，却容赍本申纳。”^④适见洽并未受宠若惊，而是头脑清醒地请求重新修改润色，俟得允当，再

行誊写进呈。果然，又经近一年的加工，于端平二年（1235）七月，才把《春秋集传》、《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及《春秋集注》等三书呈进，并专门写了进书表。书上之后，洽又补了一纸申明讳法的小贴子，阐述誊录这些书时自己对讳字是如何处理的。贴子称：“洽照得绍兴间侍读给事胡公被旨纂修所著《春秋传》书内，本文及已见援引它书应有犯渊上御名及本朝庙讳，并不改易本字，但缺点画，为字不成，覆以黄纸。今来洽所缴申三件书内有与前项事理一同，虽昨来不曾申明，辄敢冒昧遵用绍兴已降指挥体例，并依本字修写，覆以黄纸，以彰圣朝尊经术，开不讳之圣德。”^⑤足见此人办事虽亦有失，但总起来看还是很严谨的。

端平二年七月张洽进《春秋集注》等书于秘阁，但当时并未梓行。二十一年后，即宝祐三年（1255），才由方应发主持始刻于临江郡庠。该书后有宝祐乙卯（三年）临江军文学方应发的刻书后序可证。后序称：“仆生晚，安敢以芜语系公书后！既刻于学官，因考其本末如此。”此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是现知此书最早的刻本。其款式为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行字同，白口，左右双边。完全是宋代国子监刻经书的通常款式。

北京图书馆还收藏有此书的另一宋刻本，款式为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前首镌端平元年九月临江军牒文；次端平元年八月尚书省札付；次端平元年九月张洽请求修订状；次端平二年七月洽进书状；次洽申明讳字覆黄纸贴子；次春秋纲领一卷；次春秋集注正文十一卷。由于书前卷尾均无申明该书版刻情况的文字，北京图书馆只能根据别家著录和风格面貌，将此书笼统地定为宋刻本。一般地说，这种鉴定结论是稳妥的。因为一是定之有据，二是大的时代范围无误。所谓定之有据，系指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著录。因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原是清大内天禄琳琅的旧物。此书天禄琳琅原藏两部，现北京图书馆所藏者系原天禄琳琅所藏的

第二部。以书中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印记可证。今检《天禄琳琅书目后编》，非但著录了此书，并且有关于此书的自然描述。同时还说：“明初定科举制，《春秋》用胡安国传及洽集注，此书列于学官，与朱、蔡、胡、陈并行。后来学者日趋简便，遂废不行。惟通志堂有新刻。似此宋本，稀如星凤矣”。天禄琳琅既有如此的鉴定意见，北京图书馆据此定为宋刻，当无可非议。

1989年，辽宁省图书馆韩锡铎、王清源二同志在清理他们的普通古籍中，发现了一部《春秋集注》。他们怀疑是宋刻，并疑其与北图所藏此书为相同版本。于是他们来信描述他们所藏此书的版式行款及卷前附件，要求与北图所藏此书核对。结果证明北图所藏与辽宁所藏完全是同一版本。所不同者在《小贴子》与《春秋纲领》之间，辽宁那部尚保留着德祐乙亥（恭宗元年1275）卫宗武的一道序文，而北图这一部则序文久佚。有了这道序文不但可以证明其确为宋刻，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其具体的版刻年分与版刻地点。这是天禄琳琅原藏两部都缺少的序文，也是几百年来鲜为人知的序文。为了说明问题，并备以后再佚，现将这道序文全文抄录如下：

“尝闻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传考经，以经考传。’今观主一张君《集注》，纂传文载于经下，而系以诸家之说，使学者开卷，笔削之法了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遗意，而又间附以己见。索幽阐秘，研精极微，有前人论著之所未到。犹之聚宝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弗可及已。其间如论楚之救郑，既不书救，又贬称人，以见夷狄之不足进；至吴之救陈，既不书师，复不书人，以见世变之益可哀。他如于公如京师而继之以伐秦，而谓臣礼之仅存者不可废，臣礼之不专者为可贬，而两寓其旨，于葬蔡景公而继之以宋灾故，而谓用

变例以迭书，虑中国之沦胥于夷，而三致其意。若此之类发明为多，皆能沉潜书法之妙，体认史外传心之蕴，不为无补于圣经。苟惟无得于此，则若荆公惟见其为断烂朝报耳。二百四十余年褒贬之笔，夫子之志不几泯。夫此书惟临江有刊本，遭毁之后，董克翁以录本示予，谓不可不寿其传，故镌梓于华亭之义塾云。德祐乙亥菊节后学卫宗武谨书。”

这篇序文的前边大部分，无非是褒扬张洽《春秋集注》的功力、水平和价值，未脱旧日序文吹捧之窠臼，并无足取。最后几句关于《春秋集注》版本的叙述，于我们考定该书的版刻时地、版本源流，则有极高的价值。“此书惟临江有刊本”，指的就是宝祐三年（1255）临江郡庠雕印的那个本子。这是该书的初刻本。此书自端平二年张洽投进《春秋集注》等书后，过了二十一年，才由他的家乡官学率先予以刊印。又过二十年，则版片遭毁，传本日稀，故由董克翁将一录本手授于卫宗武，嘱其刊板流传。卫宗武拿到这个录本之后，便在南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主持镌板于华亭义塾。这就明确了北图所藏此书之宋刻本，实是张洽《春秋集注》的第二个宋刻本。而且是祖于最早的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今天，北京图书馆既藏有宝祐三年临江郡庠本，又藏有德祐元年华亭义塾本，双璧皆存，堪称书林佳话。所以卫宗武这道序文的复出，于搞清张氏《春秋集注》宋刻本的关系及各自的版刻时间、版刻地点等，至关重要。

北图所藏此书原是天禄琳琅插架的第二部，这一点已如前述。但在归入天禄琳琅之前，其递藏关系却不甚清楚。今书中从卷一至十一均钤有“天游轩印”朱文方印，似是可知此书最早收藏家的印记。按“天游轩”，盖是明代钱仁夫的藏书楼。钱仁夫，字士弘，号东湖，明代常熟人。弘治进士，历官工部员外郎。太监刘瑾擅权，钱士弘则及时引疾退归。待到后来刘瑾诬逮朝野有清望者，人始服其明决。钱士弘幼嗜性理之学，好著书，

学者称其为东湖先生。工书画，绘山水竹石有逸致，写字四体皆善。有《归闲文纂》、《水部诗历》行世。《春秋集注》既钤有他的藏书印记，表明此书在明代弘正间曾是钱氏的藏品。此书卷一至十一，又均钤有“朱印子儋”朱文方印，又证明此书曾经朱子儋度藏。朱子儋就是朱承爵，子儋是其字。明代江阴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其字派推考，说他可能是明代蜀府的宗人。文征明尝褒扬其为文古雅有思考。其人平生酷爱藏书，传说他曾以爱妾换取宋版《汉书》，历来传为书林趣谈。《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宋刻《文选》上，亦钤有“朱印子儋”“存余堂印”二朱记；《群经音辨》上钤有“朱印子儋”、“行素斋读书记”、“左庵”、“集端斋”、“盘石山樵”、“西舜城居士”各朱记。《式古堂书画考》说“张来仪怀友《书画合卷》后有一行云·‘嘉靖壬午存余堂重装’”表明朱子儋亦是正嘉时人，与前述钱士弘的生活时代相近。故此书盖从钱士弘家传入朱子儋家也未可知。此书从卷首至卷十一亦均钤有“范”字印及“范氏焕卿”朱记，不知印主为谁。疑其与范氏天一阁或其族人有关，但不敢轻下结论。入清之后归入天禄琳琅，成了内府的珍贵藏书。天禄琳琅藏书散出后，展转归入北京图书馆者不少，此书是其中之一者。然由于此书归入天禄琳琅之前，德祐乙亥卫宗武的序文即已佚去，而且两部均佚此序，故天禄琳琅馆臣们只能凭其版式风格，将其定为宋版。北京图书馆前辈诸君虽精于鉴定，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可靠证据，仍未定出具体的版刻时地。现在有了辽宁省图书馆所发现的一部仍带有卫宗武的序文，于是几百年悬案一朝冰释了。故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的版本，应定为南宋德祐元年（1275）卫宗武华亭义塾刻本。北京图书馆还藏一部清初毛氏汲古阁的影宋抄本，其行款版式与此本全同，盖影抄时即以这个本子为底本。

〔下转224页〕

“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晨起校于绣溪寓舍”；卷四末“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校于绣溪寓舍，己刻毕”。又后有跋，“曩从刘考功公馥借抄二刘长史合集，元礼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抄此本见寄，乃得其全。竹垞老人识”。又有“乾隆己丑七月，传钱塘汪氏振绮堂本，二十六日完。知不足斋识。”按朱彝尊跋为抄手所录，鲍氏知不足斋识语也非亲笔。然于朱跋也可知自明以来，安上集流传甚少，即朱氏初得也仅其半，后乃得其全。

是书封面有木记，虽已模糊不清，然仍可知为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是书部册之记。钤印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海陵钱犀庵校藏书籍”、“重修东观帝王书”、“犀庵藏书”、“海陵钱氏小天目山馆图书”。

作者原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特藏部

〔上接210页〕

注：

- ①《宋史·张洵传》卷四三〇。
- ②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春秋集注》方应发后序。
- ③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卷前牒文。
- ④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卷前状文。
- ⑤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卷前贴子。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孫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

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

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具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

北京圖書館藏宋版《春秋左傳正義》書影（見200頁）